

ZHONGGUO JINXIANDAISHI
JIBEN WENTI YANJIU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 段治文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段治文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 段治文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308-08390-4

I. ①中… II. ①段… III. ①中国—近代史—研究②
中国—现代史—研究 IV. ①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13612 号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段治文 著

责任编辑 孙海荣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345 千字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8390-4
定 价 4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目 录

-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兴起的历史逻辑 /1
- 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民初破产的历史必然性 /12
- 毛泽东早期思想观念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0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文化透视 /31
-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 /41
- 从多维视角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 /46
- 时代新课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前使命 /56
-
- 中国现代化的开端及其特点 /66
- 中国现代化第一次机遇的形成及其丧失 /85
- 近代中国人对现代化出路的最初探索 /99
- 近代科技与中国现代化 /117
- 中国现代化第二次机遇的形成及其再次延误 /131
-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开端 /162
-
- 中国近代科技的源起与发展 /178
- 近代中国科学观发展三形态 /194
- 中国近代唯科学主义思潮新论 /208
- 科学技术与中国近代产业革命 /219

中国近代科技教育的体制化历程	/233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科学本土化探索及其局限	/244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式大科学体制	/252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化科学观的形成及其影响	/263
梁启超对历史发展规律探索新论	/274
邓小平的政治道德观述论	/283
邓小平现代科技战略思想的演进	/295
江泽民科技战略思想演进和发展	/308
胡锦涛对统一战线思想的新发展新贡献	/319
我国社会结构变化对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重大影响	/328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兴起的历史逻辑

近代中国从被西方炮舰轰出中世纪,又被强行纳入世界历史体系,到终于确立自身独特的历史发展方向,饱尝传统儒学的士子们从众多的思潮之中,终于妊娠了社会主义的浪潮,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这其中蕴含了怎么个严密的历史逻辑推演和历史实在性的统一,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令人上下求索、颇具魅力的课题。笔者试图从近代各种思潮演进所组成的宏伟的历史大势之中,考察社会主义思潮的确立,以致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必然归趋。

一、资产阶级共和理论追求和实践 破产的历史指向

鸦片战争结束了中国闭关锁国的时代,由此肇始了中国对资本主义追求的历史。由“师夷长技”为发端,经洋务派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到戊戌维新人士力求变革封建体制,以适应新生产方式的发展,直至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实践。资产阶级共和理论在一部分思想家心目中日趋全面,日臻完美。然而,其结局却与愿望者根本相反,资产阶级共和理论在中国因无法生存而最终破产。

近代资产阶级共和的追求花去了半个多世纪的代价,然其深层的价值蕴藉,首先在于由其失败原因揭示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社会结构,展露了在中国资本主义行不通的内部机制。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外力作用下被迫产生,因而与封建性社会生产力总水平相脱节,出现了资本主义在中国虽然表面上发展,但实际上又不充分发展的矛盾,中国社会实质上仍是封建统治,这无疑是近代中国的历史结构和内在本质。

以知识分子为骨干的近代激进资产阶级政治人士,大多不是从本国资本主义经济中涌现出来,而是“东西洋留学青年,学实业者寥寥,大抵皆政治家”。^①他们从理性观念上鉴别了两种社会制度的优劣,跨越了中国资产阶级生存的特殊环境,而以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为蓝图来构筑近代中国的政体模式,正如孙中山所说:“我之为民,不过设议院,变政治”,^②却未考虑到中国之实际及资本主义发展但又不充分发展的现状。他们沉浸于救亡与强国的躁急以及对西方政体理论的陶醉之中,致使其思想与社会历史的离异。也即在封建主义仍占统治地位、资产阶级不成熟的中国,无法容纳那种资产阶级直接掌握国家政府权力机关,把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各方面都牢牢控制在手中的情况下,才开始产生的议会制度和政党制度。因而,这种共和制必然是抽出了阶级内容的、形式与内容相背离的,连孙中山自己后来也检讨说:“惟知袭取欧美三权分立之制,是以为付重权于国会,即符主权在民之旨,曾不知国会与人民实非同物。”^③同时,经济上、政治上都不成熟的中国资产阶级要求非常现实,他们只希望革命能给他们带来好处。但是,愿望和现实之间的矛盾令他们颇为失望,加上内战中物资损失惨重。于是,当资产阶级发现自己的代表者并不代表自己,也没有给自己带来好处时,又走上了回头路,“政治故态复萌”。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资产阶级自己,代表者和被代表者,都互相疏远了,都不再互相了解了。”^④既然它的政党集团的活动常游离于资产阶级经济利益之外,那么中国资产阶级就不得不在国家政权中另寻靠山。

这种资本主义道路探索的失败所展示的中国社会结构和内部机制表明,

① 《民国经世外编》,上海经世文社 1914 年版。

②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28 页注①。

③ 《孙中山全集》第 7 卷,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67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675 页。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既无资产阶级理论生存的内部土壤,更无资产阶级理论生存的外部环境。这作为一种历史基础的显现,为新的道路探索确立了历史指向,它要求从错误的道路上返回,重新思考,重新选择。

其次,在资本主义道路寻求过程中,资本主义(包括国家资本、私人资本和外来资本)在中国缓慢而持续的发展,为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流入准备了现实的社会基础。资本主义生长曾促成了19世纪末的维新变法和20世纪初的武装革命,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又无情地造成“机器所到之处,手工业的破坏好象秋风扫落叶一般,且因资本生产制造成物价昂贵的结果,中产社会渐渐沦为无产者而且是失业者”。张目四顾,“社会上困苦的失业者已普遍都会与乡间了”。人们无不体会到“资产阶级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富力,一面却也增加贫乏”。^①在西方思想史上,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种种罪恶的道义愤怒,曾是孕育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而中国更早地就对尚不完整的资本主义制度感到忧虑。孙中山在20世纪初就说:“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从前为清政府所制,欲开发而不能,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然不可不防一种流弊,即资本家将从此以出是也。”“夫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②可见,其在追求资本主义的同时,又希望限制资本主义,显示了社会主义意识的成长。

近代80年资本主义之追求就这样为其后的社会主义兴起确立了一种历史基础和现实的社会基础。它既作为一种历史材料又作为一种思想材料组成了一个巨大而深刻的历史变动图景,凸现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难题与困境。既然中国在承受着资本主义不够发展和严重的封建统治的痛苦,又承受着国际资本主义发展和帝国主义侵略的灾难,那么在这一历史与社会交替转换的关键时期,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及其文化传统(反封建)又揭示了资本主义罪恶及其历史终结(反资本主义)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就必将成为历史发展和社会基因转换的最终归结。这无疑是资本主义在中国追求失败所显示出的历史指向。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② 《民主主义与社会革命》、《提倡民主主义之真义》、《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二、空想社会主义思潮演进的内在导向

近代中国伴随着资产阶级理论的大潮,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拔地而起,形成别具风貌的社会思潮,贯穿近代史始末。它承继古代中国文化传统而来,根藏于近代中国物质经济事实之中,艰难地孕育,奋力地前行,内在地导向于社会主义。

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古老的中国文化传统随着历史的延伸,慢慢地沉积在中国人的心理之中,成为中国人寻求自身发展道路的宝贵思想资料,一旦条件成熟,它就会成为时代追求的主流。这种文化传统主要有:其一,浓悠的“大同”思想。它作为一种美好的社会模式,渴望财产公有、互敬互爱、人人平等、社会和谐。从孔子“老安少怀”的博爱济民原则,到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政”社会理想模式,以及墨子的“兼爱”、“尚同”的社会理想,都是如此。《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这就是古老中国人心中没有战争、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人人劳动、平等互助的大同美好理想。这种理想憧憬积沉于民族心理之中,成为悠长而深厚的历史传统。其二,强烈的“平均”观念和“太平”呼声。中国是传统农业国,在私有制下,土地兼并是一种不可医治的痼疾,它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处于相分离的状态,广大劳动人民要求得到自己应有的一份土地,于是,要求平均地权、平均分配的思想特别强烈。从东汉末年农民大起义首领提出“太平”幻想,到唐宋农民提出“等贵贱,均贫富”,几乎每一次农民起义都提出这个问题,无不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民痛恨剥削制度、推翻私有制的美好愿望。其三,突出的“群体”意识。传统文化注重人的社会价值,强调群体利益和群体和谐,主张人与人的和睦相处,如此才能团结,集体才有力量。所谓“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就包含了那种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合理成分。传说中的三大圣都是不顾个人利益、一心为集体、一心为公的人物,其品德一直为后人所推崇。虽然其根本目的是为维护封建统治,但后来却积淀在文化心理之中成为中国人思想中的美好传统。

“大同”理想、“平均”观念和“群体”思想等文化传统作为人们熟识的思想中介,到了近代中国,遇到了新的形势与新的环境,并得到进一步发展,从而

孕育了一条空想社会主义的脉流。首先,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得饱含传统文化的先进人士在构建中国未来社会蓝图时,思想发生了飞跃。一方面资本主义工艺技术的出现,使他们产生了运用先进工具进行理想社会建设的幻想;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商品雇佣关系以新的不平等、不公正、剥削形式出现,必然成为他们抨击的新形象;再加上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掠夺,更使他们极为痛恨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其次,阶级关系上,早期无产阶级开始出现,从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家在中国创建的工厂中诞生了第一批工人开始,到20世纪初已达百万人,他们大多是破产的农民,集中在大中城市,受到世界上少有的剥削压榨,他们天然地反抗资本主义制度,又本能地向往新型的公有社会。1840—1904年有文字记载的工人斗争就达50余次。再次,政治上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和阶级斗争。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政治上丧失主权,经济上财力枯竭,农民破产,起义不断,从而一方面随着民族危机加剧,出现了论证中国如何摆脱殖民苦难、实现独立和富裕的各种空想主张,另一方面激烈的阶级斗争又促发了探索如何实现社会安定、公道合理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以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劳苦民众。

在这所有因素的促发下,空想社会主义思潮成为近代中国思想的一股脉流。从洪秀全《天朝田亩制度》,到康有为《大同书》以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都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抨击封建统治,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揭露资本主义的弊端,并论证中国未来的理想社会,具备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认定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内容,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特色。他们建构了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框架,其思想核心是土地为本,强调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强调按劳分配和人际平等。它以其一系列可贵的理论贡献,为近代中国创造了一个良好的追求美好理想、公有平等的理想环境,成为中国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重要思想来源,并内在而直接地导向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在行进过程中,遇到资本主义实践在中国和西方都出现了挫折和危机,更趋活跃,在社会主义思潮的形成中具有不可低估的文化价值。

三、资本主义文化危机与中国启蒙思想的新取向

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发展过程中,思想家们从未失去对西方文化的景仰,他们倡行戊戌变法,进行辛亥革命。他们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时,认

为仍是学习西方不彻底。1916年2月,陈独秀指出: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他号召青年“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集合于科学与民主大旗之下,求个性解放,达到学习西方之最后觉悟——伦理的觉悟。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再次深入。然而,正当以陈独秀为主干的《新青年》杂志,大声疾呼提倡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彻底抛弃中国封建传统旧文化之时,“孰知西方文化之危机已挟西方文化而俱来”。^①中国启蒙思想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

空前野蛮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西方近代文化即资产阶级形态的文化带进了一片悲凉颓败之中,战争的巨大消耗和惨重破坏所形成的危机阴影笼罩着整个西方社会。这种西方文化危机骤然震撼了正在倡行西方文化的中国思想界。1920年,欧游回国的梁启超立即发表《欧游心影录》;其随行者张君勱也作了《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的演讲;《东方杂志》等连篇累牍地登载有关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种种现象;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蔡和森、周恩来等也对此有较系统的介绍和析述。他们纷纷指出,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陷入衰颓、紊乱和闭滞,而战争耗费巨大,于是,大发纸币,增加公债,多征租税、信用券、国库券、公债票和各种银行券充斥市场,币值摇动,经济恐慌。^②“资本及生产力差不多到了零度”,^③世界经济贸易严重失衡。政治上,阶级斗争日趋高涨,国际争夺愈演愈烈。“1919年各国罢工事件,此起彼伏,几无一日之息”。^④英国工人罢工“至休战后而大著,1919年1月至7月,竟发生911次之争议,而关系的人数达1,794,000人之多。8月以后,更形猛烈”。^⑤蔡和森亲眼所见的法国劳动运动更是如火如荼,九大行业联合要求产业国有,把政府吓得魂飞魄散。^⑥而各大帝国主义之间瓜分世界之争夺,战后再次加剧。巴黎和会上明争暗斗,和议订立后更显剑拔弩张,沉重的军费负担,压倒战后疲惫的西方世界,其结果是“人民的受

① 胡先骕:《说今日教育之危机》,《学衡》1922年第4期。

② 蔡和森:《社会进化史》,《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③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上篇(二)(四)。

④ 罗罗:《一九一九年与世界大势》,《东方杂志》第17卷第1号。

⑤ 若尘:《英国劳动争议之真相》,《东方杂志》第17卷第1号。

⑥ 蔡和森:《法国最近的劳动运动》,《少年世界》第1卷第11期。

苦比大战最昏黑的时候还要昏黑”，“欧洲现在已成了世界的病夫”。^① 社会意识形态上，大战给西方人民带来了虚幻、悲观和颓落。战后物质生活的枯竭，和平理想的破灭，更加重了精神的苦痛。《东方杂志》转载《大西洋》月刊的文章《战后之世界病》，指出战后欧美社会的病状概括为 7 个方面：(1) 人人皆寻求人工的娱乐，犹如中狂，而大喜觅不愉快的娱乐；(2) 喜夸耀自炫，不务实际；(3) 犯罪者日众；(4) 好冒险投机；(5) 残忍刻薄；(6) 希望发财之心甚切；(7) 不愿操正当之工作。文章慨叹道：“这样的社会风气，使一切道德传统、宗教戒律，均不足以维系人心，此诚当世之大患”，^② 上层思想界纷纷表现出悲观主义、怀古主义、改良主义倾向，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在大战时完成的《西方的没落》一书轰动一时；著名科学哲学家罗素承认：“欧洲文化的坏处，已经被欧洲大战显示得明明白白”，他来中国讲学，告诫中国人要为自己的国家和世界人民谋幸福，决计不要“一味效法西方”。^③

欧洲大战引起的西方文化危机，严重震撼了中国思想界，促使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深刻反思，思想观念也由此经历着急速的变动，出现了启蒙思想的新取向。首先，否定“生存竞争，优胜劣败”，而倡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进化论。达尔文生物进化原理原本是中国启蒙思想家学习西方、寻求富强的理论依据，如今，大战的灾难使他们感到正是“自十九世纪物竞不择之说兴，而利己主义、重金主义、强权主义、军国主义相继迭起”。^④ 因之，“强凌弱，众暴寡，遂成今日之世界焉”。^⑤ 认为“此次惨无人理的欧洲大战”全由此产生。于是，“反对竞争论，而思以互助主义代之”。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畅行，并在五四之后，互助观几乎为进步知识分子所普遍接受。其次，由于对大战的厌恶，开始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向世界主义、大同主义转变。他们相信世界主义、大同主义“必为世界人类共同之蕲向，要无可疑”，认为唯有“促成国际主义、世界主义之实现，保障世界之和平，增进人类之福利”。^⑥ 这成为中国当时一般思想界趋同的认识与精神向往。再次，启蒙思想家们对原本所提倡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感到失望，从大战中看到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

① 马鹿：《佛朗西访问记》，《东方杂志》第 18 卷第 13 号。

② 见《东方杂志》第 17 卷第 14 号“世界新潮”。

③ 罗素：《中国人到自由之路》，《东方杂志》第 18 卷第 13 号。

④ 高劳（杜亚泉）：《金权与兵权》，《东方杂志》第 15 卷第 5 号。

⑤ 植夫：《人类之生存竞争》，《学艺》第 2 卷第 5 号。

⑥ 君实：《文化的国家主义》，《东方杂志》第 17 卷第 16 号。

性,认为议会“所代表者,非多数恃劳动为生之国民之思想与利益,惟少数地主资本家之思想与利益而已”,议员“形成一个阶级,与国民一般之利害完全两途”。^① 1920年,新民学会在讨论建设“湖南共和国”方案时就鲜明地指出,既不要中国式的共和国,也不要美国式的共和国,因为“美国式的共和国只可算是资本家、绅士、贵族的共和国,只有资本家、绅士、贵族享受幸福。至于平民呢?劳动者呢?一样的受痛苦。”^②又次,中国思想界由于对西方文化的危机感引起根本变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要求,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是“现今社会生活之最大祸根”。^③ 1920年5月《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纪念“五一”专号中,响亮地喊出了“毁灭资本”的口号。

由此可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弊病大暴露,引起中国思想界深沉的反思,出现启蒙思想的新取向,此即趋向于互助进化、财产公有、世界主义、平民主义、大同主义。这一新取向的发展使中国思想界直接趋向于社会主义。这种新的社会思潮的变动,无疑是在整个世界文化变动催迫下,在近代中国思想演进的推动下,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思想变动的结果。从此,社会主义如同排山倒海而来的“大潮流”,无论什么阻力都不能阻止它的发展。^④

四、四股强力同时趋进及十月革命的榜样： 社会主义思潮的形成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选择

正当中国面临新的选择时,由四股力量所组成的历史强力开始在五四前后的中国集结凝聚:中国80年资本主义追求失败,它以严峻的经验教训历史地指向于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思潮正日行推进,沟通着中国人与社会主义学说之间的联系;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发生危机;社会主义思潮正在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中国思想界直接地参与并作出了社会主义的新的价值取向。于是,他们更有历史眼光,更具世界意识,更存社会主义之自觉。1919年11月,瞿秋白就提醒人们“揉揉眼,看看清楚”,自己站立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情

① 若尘:《议会政治之失望》,《东方杂志》第17卷第17号。

② 《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7页。

③ 郑振铎:《现代的社会改造运动》,《新社会》第11号。

④ 《新潮》第2卷第3号。

形？汹涌澎湃的新潮流究竟是怎样兴起来的？他说：“中国人尤其应该觉悟得快一点，要有世界的眼光，知道新思潮是壅不住的，赶快想法子去适应世界的潮流，迎合世界的形势。”^①毛泽东、蔡和森等创立新民学会，明确提出“改造中国和世界”，表示“倾向于世界主义”，认为“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正是这种历史之伟力与思想理论大势将中国思想推向社会主义的潮流。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泛劳动主义等一起被中国人统称为社会主义而接纳了过来。

由于历史的推进力，早在20世纪初，在正摆脱世纪末的绝望空气、重新审视一切的中国，大批有识之士就已从人道和伦理出发，对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贫富分化和工人受奴役的罪恶进行了有力批判，指出“今日欧美之富量惟在少数，贫富阶级悬绝不平，劳动者之痛苦如在地狱”。“贫富悬隔，譬云霞之与渊泉，祸乃愈酷，卒使劳动者无所投足”。^②认为用血汗创造世界的工人“有功于资本家却反受资本家之戕贼”。因而，他们都已转而向往更具人情味的“近世之美丽精神”——社会主义，认为这一“以人情主义为根本，废私有资本，主张劳动之权利”，提倡“协同和爱”的社会主义“其精神诚为美善”。^③这时最具吸引力并被最早接受的社会主义内容，乃是实行公有制、各尽所能、各取所值这一理想模式，这反映了深受平等平均思想影响、空想社会主义思潮推动，又在实践资本主义过程中颇受挫折的中国人对美好理想的向往。这种对理想模式的向往到五四运动前后，当四股强力同时起作用之时，也即资本主义在中国和西方同时失败、社会主义思潮风起云涌之时，中国人就急迫地希冀不经过革命而直接跃入社会主义，走上了无政府改良主义道路。于是，在北方开展了广泛的工读互助和新村运动；在南方毛泽东则发动了湖南自治运动。他们认为“阶级斗争只能解决社会的物质问题，不能解决社会的精神问题，后者的解决只能用互助办法，以人道主义和勤工主义精神来改造掠夺主义经济制度”，^④声称“若是工读互助团果然成功”，那么“‘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理想”就能实现。^⑤这种理想与幻想直接推动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

① 瞿秋白：《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新社会》第1号。

② 朱执信：《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见《朱执信文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③ 《社会主义》，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4月版。

④ 《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36页。

⑤ 《少年中国》第1卷第7期。

这是中国思想界面对历史强力冲击所作出的最初反映,是为弥补 80 年资本主义实践失败所造成的损失的急迫追求,也是中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自然延伸。

然而,这些实践只是截取了社会主义的最高理想,却缺乏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由此理论基础所推导出来的达到这一理想的途径,因而很快就失败了。1920 年底,毛泽东就指出:“几个月已看透了,政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绝无希望”。中国先进分子对理想社会的乐观眺望及其空想建构的努力很快以失败告终,群起的社会主义流派在相互牴牾中曾出现一时的多姿,又因自己的理论破绽和设计漏洞而色泽褪尽。经此挫折,先进人士开始集中注目于科学社会主义,因为科学社会主义不仅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模式,而且还有其理论基础——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以及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以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阶级斗争。从而,马克思主义以其理论的系统性、成熟性及可取性、可操作性,从众多的社会主义流派中凸现出来。加上十月革命的成功,以社会制度的剧变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它作为一种美好的榜样更使得经过改良实践失败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深受教育和鼓舞。陈独秀因此告诫“留心改造社会”的人,“万万不能妄想拿乐观的理想来自由改造,因为有机体复杂的社会不是一个面粉团子能让我们自由改造,近代空想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之重要区别就在此一点。”^①他很快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1 年 3 月,李大钊更明确指出:中国必须走“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的道路。他欢呼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毛泽东则慨叹:无政府主义等温和方法都是“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做不到,非得政权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从而深信改造中国社会只能用“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这就明白地暗示了他们在近代思潮的推动下、十月革命影响下服膺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轨迹。从此,中国思想界发生了质的飞跃,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强力的推动下在中国骤然兴起,进而成为中国人民的唯一选择。

^① 《少年中国》第 1 卷第 7 期。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出现绝非偶然的、孤立的现象,绝不是一种孤单的思想移植,也不是极个别人的思想摄新,而是中国人面对新的选择时,由世界文化变动催迫及中国整个思想大势演进所引起的反响和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出现无疑体现了这种历史逻辑推演与历史实在性的统一。

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 在民初破产的历史必然性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为什么会破产？这是教学与研究过程中必须重点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我们认为，对此不能仅仅从事件本身去找原因，它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结果。因此，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情境，也即要将它放在整个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去考察；放在整个中国国情中即历史生态结构中去考察，从中可以发现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虽然一度出现，却是近代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不存在其生存的基础。

近代中国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下完成了“千古未有的变局”，这种迅速变革使得历史情境表现出许多矛盾状态，从而使整个近代中国出现了跨越性发展的现象，出现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思想诸要素的表面虚假变化，在某种形式上改变了社会形态演化的理论图景。这反过来又影响了近代中国先进人物的思维发展及其追求。

近代中国社会进程中的矛盾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又发展不充分的矛盾。

19 世纪中叶开始，近代资本主义因素的出现与发展已经突破明清之际的水平，特别是经过洋务运动，兴建了大量新式厂矿企业，资本主义开始在中国